

# 捧出历史真相：Trueman 董健

苏琼

《社科信息》2000 年第 8 期

—

时维五月，笔者在金陵变幻莫测的天空下，走访了中国戏剧史家、博士生导师、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。作为一个学者，董健教授真诚的反思态度、彻底的批判精神，让笔者敬佩不已，不由不从心底里尊他为 Trueman——“真人”。现将采访所得的部分内容与朋友们共享。

记者：在学术圈里，大家都知道您是戏剧史研究、田汉研究的专家。但对于您的治学道路很多人并不了解，能否请您谈谈这个话题？

董健：我对自己的治学道路有这么两个看法：一是充满曲折，变来变去，煮“夹生饭”的痕迹非常浓；一是起步迟，真正的学术研究从七十年代末才开始。孔老夫子说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”，我是该立的时候“立”不起来，该不惑的时候“惑”得正厉害。

我 1956 年考上北京俄语学院读俄文，一年后中苏关系变化，不得不改专业，转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从头学起，总共念了六年本科。真正读书的时间只有在北京的那一年，1957 年到南大后就卷入“反右派”、“大跃进”等政治运动。我那时很想搞文艺批评，就读《别林斯基选集》，还画了一幅别林斯基的画像挂在床头。这成了在班级开展的“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”运动中，我被批判的一个重要的证据——你看，居然想做别林斯基！在读书就是走“白专道路”的情况下，你要是念书就会有罪恶感，也就根本谈不上做学问了。1962 年我成为陈中凡先生的古典戏曲研究生。正要搞研究做学问时就到农村去搞“四清运动”了。毕业时学校规定不用答辩，论文也不准写专业。我写了一篇《把贫下中农青年培养成革命事业接班人》的“论文”就毕业了。

我读大学时曾参加编著文学史研究论文集《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》。现在看来它是很左的，但在“文革”中也变成了一种罪行。“文革”后期，我和叶子铭老师被调到省革委会的大批判写作组，奉命批判田汉的人性论。虽然写出的文章因达不到政治要求而未能发表，但我乘机读完了田汉的著作，做了很多笔记和卡片，特别是对田汉的《田汉传》帮助很大。大学复课后，我给学生讲“样板戏”评论，写过许多吹捧“样板戏”的文章。后来出论文集《文学与历史》时，我带着一种忏悔心情，本想附几篇“文革”中写的文章，让人看看我的另一面，没得到认可。我不愿回避历史，从吹捧“样板戏”到批判它，可以看出文化价值观念的转换，毕竟写这些文章也不是被迫的。

因为教“样板戏”的缘故，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从古典转到了当代，参编了那套大学文科教材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（上下两册）。1978 年陈白尘来到南大，将我调到了戏剧研究室，本想借此机会转回古典戏曲研究上去，但由于当时工作的需要，我开始了现代戏剧的研究，着手写《陈白尘创作历程论》。其后和陈白尘领到了国家“六五”计划的一个项目，编写《中国现代戏剧史稿》。这部书稿完成后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写《田汉传》的约稿就来了。

时，我开始体会到治学路子变化多端的利弊，它的弊端就是比较肤浅，不深入；优点也有，如田汉就是戏曲与现代戏剧都兼顾的，这与我的经历相契合，如果没有古典戏曲的底子很难写好田汉。

在写《田汉传》的过程中，那种煮“夹生饭”的苦味才尝到。由于过去没学好外国文学的关系，我就捉襟见肘，不得不边写边补课，又运用文学传记与学术研究相穿插的写作策略，记下了我在编现代戏剧史时思考过的问题。其除了把《田汉传》改成了一个简本外，我在学术上没有大的动作。我的治学经历基本上就是这样。虽然也获得过奖项与荣誉，但是我对自己的治学成就估价不高。

记者：您太谦虚了。不过从您最近一两年发表的文章看，您较多地提到的是知识分子立场与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问题，明显地走出了专业的小圈子，不知是什么促成您的这一“转向”？

董健：1998年以来，我受到学术界的一些刺激，开始思考新知识分子与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问题。过去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，我的文化/思考资源是五四启蒙话语。我在写《中国现代戏剧史稿》和《田汉传》的时候，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民主、自由、个性解放等问题。九十年代“后学”进来后，我发现一些年轻人要解构五四启蒙话语，否定现代性，这与我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。福柯、赛义德、德里达、利奥达的那一套，部分地可以提供一些参考，促使我进一步思考现代性问题，但从整体方法上不能动摇我。因为我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还必须坚持现代性。我在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诞辰百年学术会上的讲话中，就提出了文学研究现代性的五条标准。《20世纪中国戏剧史论：脸谱的消解与重构》这篇论文遵循的也是这一思想。

我们这些坚持启蒙立场的人，提倡思考。那些后现代人士嘲笑我们：“你们还思考吗？你们一思考，上帝就发怒了。”我说：既为学人，宁可一世无钱亦无权，不可一日不思考。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，若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无异于没有生命，从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“我思故我在”，那怕是错误的思考都比没有思考好。有思考才有批判，知识分子需要批判性：不只是批判腐败的社会，对秩序正常的社会也要批判。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歌颂、解释秩序的状态，他的思考力基本也就结束了。而他们一旦放弃了思考的权力，就会产生奴性，象我在《告别“花瓶”作家的忏悔》中说的那样。

另外，我发现“后主”们喜欢发空论，还有一些人怕将历史真相摆出来。而我必须把历史的真相捧出来，所以从扎实的资料入手，主编了四百万字的《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》。这部工具书对1901年到1949年的戏剧剧本——主要是话剧，作了一个全面调查，为每一个剧本都写了内容提要。

记者：您带过许多硕士生和博士生，其中不乏优秀人材，想必您在治学方法方面很有心得。

董健：我的治学方法比较保守，就是改造地利用桐城派的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。义理，包含着对生活的体验、看法，甚至还有部分抒情性。我认为科学研究也要有感情，好的学术文章是有抒情性的。没有感情文章写不好，你的爱恨、追求都在义理里面。考据，就是把历史弄清楚。只有在把历史弄清楚的前提下，才能阐释观点，否则就是胡说。比如我写《田汉传》就把田汉讲过的一些并不真实的话都考证出来了。但不能为考证而考证，考证要说明问题。除此之外，辞章也很重要。梁启超说：“笔端常带感情”，这个感情就要靠辞章表现出来。文词需优美、生动，不能

太死板。

记者：那么处在世纪末，您又怎样看待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呢？

董健：当前学界腐败的主要表现，就是弄虚作假、粗制滥造，思想萎缩、市侩主义，泡沫学问、文化垃圾满天飞以及抄袭、剽窃成风等等。究其根源，我认为是社会风气与管理体制所致。管理上追求一些浮夸的“政绩”，样样指标，样样都“量化”，而没有质量监督。个人为了上职称，学校为了上档次，都在强调多出成果，于是不得不突击出书，时间来不及就抄，进行泡沫性生产。再加上单位的保护主义，在反腐败过程中，以腐败反腐败。这样，对学术界不良风气的整顿，短期内就很难有疗效，我们没法抱乐观态度。

学界的腐败，也是文化转型时期文人思考力、创造力衰竭的一个表征。建国五十年来，我们先是以政治运动代替教育，之后教育又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，它从没得到过良好的充分发展。没有好的人文环境，学人们的素质普遍低下。他们只顾满足自身的需求，放弃了社会责任感与更高的理想，失去了学术激情，或者说没有找到学术激情。我们学术激情体现在对社会对生活的态度、对未来的理想与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中。你的思想需要释放出去，要得到认同，要影响别人乃至社会，这就是激情。人文学科与理工科不同，我们从事的是精神生产，我们的成果必然与我们的精神境界有关。人文学科的没有学术激情，他的价值就无从体现，也就失掉了生存的立足点。所以从事人文科学研究一定要有坚守阵地的精神。这样再通过整个体制的改革，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秩序，学术腐败才能得到扼制。

2000/5/2